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105 期
2012 年 2 月 15 日

民国民族史研究专辑之二

目 录

【论 文】

- | | |
|----------------------------|-----|
| 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 | 沈志华 |
| “三区革命”为什么没有最终促成新疆独立？ | 薛衔天 |
| 抗战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扩张渗透与“三区革命” | 王欣登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¹

(1944-1950)

沈志华²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中苏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几年以后，政权发生更迭，而同盟关系则又上了一层楼。在此期间，中苏双边关系中的新疆问题始终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地位，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也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本文拟对这一过程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民国以来，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实际控制之外，军阀割据，内乱频仍。30年代中期，苏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在新疆的影响，而把新疆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不过，当时国际形势风紧云急，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于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所以，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斯大林却还无意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以免由此刺激中国。[1] 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与苏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即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现状。

不久以后，国际局势骤变，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初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势力全部撤出了新疆。[2] 当1942年底蒋介石颇为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3]的时候，中苏两国关系降到了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最低点。

然而，就在苏联势力被迫撤出新疆之际，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到1944年夏季，苏联不仅能够正式提出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而且还完全有时间和精力策划如何对新疆卷土重来了。

三区革命：苏联策动和支持的民族起义

1944年初春，中蒙在新疆与外蒙交界的阿尔泰地区发生冲突。[4] 对于苏联重新染指新疆的企图，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一方面调兵遣将，摆开了不惜一战的架势，一方面不断向罗斯福告斯大林的状，试图对苏施加外交压力。[5] 但是，美国对阿尔泰冲突和蒋介石的申诉反应极为冷漠。罗斯福先是在4月8日建议中国政府“冻结”新疆事件，到战后再解决，继而在4月10日劝告蒋介石对苏联要忍耐，要顾全大局，后来甚至禁止中国再扩大反苏宣传。[6] 罗斯福所说的大局非常清楚，即为了最后在亚洲战胜日本，中苏必须联合，共同对敌；为了战后远东秩序的稳定，必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是需要莫斯科认可的。中国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意见。

¹ 本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链接见：墨者资讯网 <http://www.cnmoker.org/Paper/Political/Other/1113153b52009153985.shtml>，

及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http://www.xjass.com/ls/content/2010-11/18/content_175802.htm。

²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4月19日，蒋介石批准了一项缓解中苏在新疆的紧张关系的计划，决定先严令新疆当局力避任何边界冲突，再寻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以取得苏联的好感。[7]

不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和中国，以推动中苏接触。王世杰受蒋介石委托于6月16日专程到迪化迎接华莱士，并叮嘱盛世才不得在华莱士面前公开攻击苏联。6月24日华莱士离开重庆时，蒋介石托宋美龄致函罗斯福，答应美国倘有任何改进中苏关系的办法，中国必全力以赴。[8]

然而，此时解决中苏双边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苏联手手中。在这场未来的外交较量中，无论是实力地位还是国际影响，苏联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从国际环境考虑，苏联也感到有必要改善苏中双边关系，但两国之间在处理战后关系方面，毕竟存在着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的重大利害冲突。因此，在盟国之间酝酿中苏双方应该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直接谈判时，苏联的策略是，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对中共的不支持立场，一方面则不断加紧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谈判桌上能够取得预想的收获。

5月中旬苏联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做出明确保证：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不再援助外国共产党。苏联政府现在不给，将来也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任何援助。[9]9月8日，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纳尔逊和赫尔利大使告诉蒋介石，莫斯科对华空气现已好转。莫洛托夫对美国人说：苏联愿意见到中国强盛和统一，中共并非共产党，苏联也无意支持中共。[10]

与此同时，斯大林显然认为需要让蒋介石切实体会一下苏联的力量和决心。1944年6-7月，苏联从成都、西安和兰州撤走了最后一批大约60名苏联军事顾问。同时，苏联的报刊也增加了批评中国民族主义倾向的评论和报道。7月间，苏联还向美国表示，苏联政府不愿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与中国一起讨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问题，而建议单独举行两个三国会议。本文来自墨者资讯

更为严重的是，10月11日苏联接受位于外蒙古西北边界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州。关于唐努图瓦地区的问题，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曾特意向罗斯福提起，认为应在战后同蒙古问题一道与苏联谈判解决。[11]现在，苏联竟如此轻而易举地吞并了这片17万平方公里曾属于中国的土地，这无疑斯大林向蒋介石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

然而，与上述一切相比，真正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威胁，并使蒋介石政府感到震惊的，是苏联在新疆采取的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武装暴动的行动。这就是新疆上著名的伊宁事变，或称三区革命。

早在苏联势力退出新疆的时候，莫斯科就开始策划一次以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统治为特征的武装行动了，并为此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

在思想方面，苏联的方针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据当时在塔城地区任副专员和政府秘书长的哈吉耶夫说，苏新关系破裂以后，苏联曾一度试图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共产主义措施，指望通过宣传共产主义鼓动人们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但是由于少数民族都不接受这些宣传而没有成功。以后，苏联才改为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特别是泛突厥主义，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12]苏联在北疆大规模号召少数民族起来反对汉族政府的压迫是从1943年开始的，那时，塔什干出版的《东方真理》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维文、哈文报刊，已经大量运进新疆，这些报刊不断发表声援和支持新疆少数民族斗争的文章。1944年夏季，在迪化、塔城和伊犁经常发现有“新疆解放”等地下组织散发的传单，而这些印刷精美的传单显然不可能是在新疆印制的。在这些传单中，传播最广、效果颇大的是一种专门对伊斯兰教民的传单，该传单介绍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伊斯兰教人民大会，并直接号召伊斯兰教徒团结在苏联周围以争取民族的幸福和解放。[13]

在组织方面，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苏新关系破裂初期，后来成为

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的阿巴索夫等人在伊宁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其中就有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西里·瓦西里诺维奇参加。[14] 苏联军官还直接出面领导反抗组织，如 1943 年在阿拉木图成立的“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是曾经帮助盛世才剿灭马仲英和张培元的红军将领叶夫西爱夫组织的，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联络伊犁民族上层，组织武装暴动。[15] 当时在新疆最大、最有影响的地下组织“伊宁解放组织”，也是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于 1944 年 4 月 9 日成立的。与苏联在新疆的政治鼓动和思想宣传相一致，该组织的主要领导力量是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宗教、大牧主等民族上层人士。[16] 这种组织结构，决定了三区革命初期的政治走向。

在军事方面，苏联的主要作用是大量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武器，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并派军事顾问参与对新疆游击活动的领导和组织。早在 1943 年驻守哈密的红八团撤退回国，经过伊犁边卡时，便将该部队的武器悉数藏匿于民间，以为日后采取武装行动所用。[17] 1943 年 10 月，在苏联接受军事训练达两年之久的达列力汗回到阿山地区进行游击活动时，苏联应其要求，派出了 12 人顾问团，随同他经外蒙古到达青河。1944 年 4 月上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以视察边境为名来到新疆青河县，会见了反抗组织首领乌斯满，并给他派来了一批军事顾问，运来了武器弹药。在乌斯满和达列力汗发动阿山暴动过程中，他们不断从外蒙古方面得到大批武器。[18] 苏联还为新疆少数民族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和指挥人员。当时，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阿拉木图基地负责正规战训练，而安集延基地负责游击战训练。[19] 三区革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伊斯哈克伯克在 1942 年初逃往苏联后，就在苏联的支持下，将聚集在那里的 200 余名逃亡者组织起来，编为两个大队，进行和军事训练，并在苏联筹建了蒲犁解放组织和蒲犁游击队。[20]

1944 年 10 月 30 日，鉴于在伊宁发动武装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伊宁解放组织”便派遣阿巴索夫去苏联，洽谈购买军火事宜，并很快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游击队。11 月 4 日，“伊宁解放组织”根据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建议，趁伊宁驻军的主力部队已调往巩哈县的机会，秘密发动和武装群众，同时派人与巩哈游击队取得联系。11 月 6 日，阿巴索夫偕同苏联军官亚历山得洛夫率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从苏联经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伊宁，会同“伊宁解放组织”组成了以亚历山得洛夫为首的军事指挥部，并决定在 11 月 7 日举行全城暴动。[21]

暴动开始以后，苏联军人立即投入了战斗。随着战事的展开，又不断有增援部队自苏联入境。11 月 12 日，由苏联军官波里诺夫率领一支机械化装备的俄罗斯族部队入境参加作战。11 月 16 日，伊斯哈克伯克和苏联军官斯坎德尔率一营骑兵，越过国境攻打艾林巴克。到 1945 年 1 月初，苏联又在其境内中亚地区各穆斯林民族中组织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进入新疆后，一部分去果子沟阻击迪化政府的增援军队，一部分参加了攻打艾林巴克的战斗。鉴于大量苏联军官和军事人员进入新疆，为了协调关系，协助指挥，1944 年 11 月下旬，苏联派出了以柯兹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和以斯特潘诺维奇为团长的内务部顾问团（代号分别为“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来到伊宁。不久，苏联又派出一批苏联军事教官，在霍尔果斯口岸举办军官培训班。每期 3 个月，先后举行了 3 期。毕业的学员分配到各游击队担任军事指挥员。[22]

此外，在新疆的苏联侨民也纷纷参与了三区革命。作为伊宁事变先声的 1944 年 8 月“巩哈暴动”，就是苏联侨民帕提斯·莫斯里莫夫等人利用在苏联境内换取的武器，组织游击队发动的。[23] 另据 1945 年 11 月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的调查报告说，绝大多数旅居新疆的俄罗斯侨民“怀有对自己祖国的爱国主义感情”，正在积极投入武装起义。[24] 显然，曾在伊宁工作的中共代表彭国安的结论是可信的：“伊犁的局面确实是靠苏联军队打出来的”。[25]

新疆独立：与结盟谈判的外交筹码

伊宁暴动发生后，新疆当局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苏联。1944年11月11日，新疆军政首脑朱绍良和吴忠信联名致电蒋介石：以目前情势而言，对苏外交如无彻底调整办法，则如伊犁事件，自必层出不穷，新疆前途亦将日趋恶化。蒋介石在11月25日的回电中也感到问题严重，他一方面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指示新疆当局立即就地与苏方进行交涉，只要能够保全领土和主权，可以在合作方面尽量迁就。伊宁失守以后，1945年2月19日吴忠信致电蒋介石称，如此下去，新疆恐怕将成为第二个东北，只有通过外交渠道的有效疏解，才能收拾目前局面。[26] 事态的表明，吴忠信对新疆势必大乱的形势估计是准确的，蒋介石对领土和主权的担心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伊宁事变的最初目标就是要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

苏联驻伊宁领事在暴动的第二天就派人与“伊宁解放组织”领导人热合木江联系，商议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并就政府成员名单进行了讨论。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即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艾力汗·吐烈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旗。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宣言明确宣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而独立。[27]

然而，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对华政策的真实目标，也不是苏联策动和支持三区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伊宁事变中，如果说三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真正把新疆的独立作为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那么莫斯科不过是利用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苏联在华利益的一个手段。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环境来看，苏联都不可能要求和实现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标。

就苏联国内情况而言，与新疆接壤的主要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如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些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与新疆的少数民族在种族上，宗教上，乃至血缘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国内在战后仍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民族矛盾，可以想象，如果苏联支持在这些共和国的边疆站立起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会对本国的少数民族产生如何强烈的负面影响。既然新疆的少数民族可以脱离中国而独立，那么苏联的同类民族就不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吗？[28] 就苏联的国际环境而言，与中国的关系既受制于对付苏联在远东的宿敌日本，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政策。无论如何，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处理战后世界格局的总体原则出发，苏联需要的是同中国保持友好和盟国关系，而决不是为新疆问题与中国对立，甚至兵戎相见。

当然，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对大而弱的中国不是没有所图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利益限度的问题。从上看，俄国的在华利益涉及到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地区，即东北、蒙古和新疆。早在19世纪末，俄国就为了在太平洋寻找不冻港和出海口而与日本激烈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为了保证西伯利亚铁路动脉的安全，则致力于在蒙古地区建立一个广阔的缓冲国。斯大林正是依据俄国在远东的传统外交战略，确定了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目标：在东部，以夺取中东铁路和恢复对旅顺口的控制，建立从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在中部，以策动外蒙古脱离中国，建立苏联卵翼下的独立国家为目标。[29] 显然，面对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干预，苏联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已非易事，如果再搞出一个新疆独立的事件，势必影响全局。因此，苏联对中国西部的目标是满足于保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影响，促成一个在莫斯科控制之下，或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从现实的角度看，在新疆实现这样的目标比较容易，且不会引人注目。

在这方面，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尽管中国提供的情报极力渲染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倾向，但他在1945年3月9日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中认为，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

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因此，对于新疆来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主权问题将处于次要地位”。[30]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苏联对新疆问题的真实考虑，说明了苏联策动新疆事变和支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举措，不过是为实现其在华根本利益而施展的手段罢了。

正当三区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了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会议。鉴于对德战争即将胜利结束，而且这次美苏首脑接触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在远东地区全面要求的最后机会，因此可以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的要求。在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晤和2月11日关于远东协定的讨论中，根据苏联的要求，苏美英三国领袖一致通过了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条件：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大连作为商港的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和中国在满洲的主权。

最后，苏联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在这里，斯大林只字未提新疆问题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疏忽，这恰恰反映了在苏联对华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根本利益当中，新疆问题只是莫斯科随时准备打出的一张外交牌。所以，苏联一方面希望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些要求，[31]一方面试图把新疆问题作为筹码，通过中苏直接谈判实现这些设想。

为了使中国能够接受雅尔塔协定，苏联开始注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在解决新疆问题上加快了与中国的接触。自潘友新被召回国后，空位近一年之久的驻华大使之职终于有了新的人选。1945年4月，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在赴任途中专程在新疆停留，听取了驻迪化总领事的情况汇报。4月13日，当蒋经国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抵达迪化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负责人会见了他们，双方就苏联与新疆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32] 特别是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4月15日和26日，出席会议的宋子文连续电告蒋介石，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好。6月13日，奉命去莫斯科了解罗斯福去世后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的霍普金斯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宋子文举行了一次重要会晤。霍普金斯十分明确地向宋子文转达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而且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苏联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与苏军合作组织当地的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与苏联无关”。[33]

莫斯科在中苏谈判之前做出的这种友好姿态，当然是为了诱使中国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接受苏联的条件。在处理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对外蒙古和东北的要求作为不可更改的目标，而把新疆及对待中共的态度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大体上就是按照苏联设计的轨迹展开的。[34]

7月2日，中苏正式谈判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症结主要出在外蒙古问题上。[35] 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宋子文并没有把蒙古问题作为会谈中的主要讨论内容，因为苏联要求的是在外蒙古“维持现状”，中国对此的理解就是仍然保留中国的宗主权。[36] 因此，斯大林在会谈中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使宋子文感到十分意外。在第三轮谈判中，双方在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争论激烈，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37] 面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和美国政府在谈判初期采取的妥协和不干预态度，地位软弱的中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了。7月6日至8日，蒋介石在与王世杰等人商议后，连续给宋子文发出4封电报，表明了中国让步的界限：如果苏联能保证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不再支持中共和新疆暴动，则中国政府将在抗战胜利后自动提出通过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建议，同时，中国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东北的铁路干

线和旅顺港由中苏共同使用，但管理权归中国所有。[38]

这个消息正中斯大林下怀。于是，在7月9日的第四次谈判中出现了转机。斯大林对宋子文提出的新建议做出了回答：关于东北，苏联愿意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坚持旅顺港须由苏方管理）；关于新疆，苏联同意“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协助平息暴乱，并认为中国政府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是适宜的；关于中共，苏联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唯一对象，不向中共供应武器。[39]

这样，在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中苏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在中国与外蒙古的边界划分，以及旅顺港的管理等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担忧似乎是解除了。1945年7月17日，蒋介石命朱绍良、吴忠信着手准备在10月间收复伊犁的事宜。[40]

和平谈判：莫斯科施加影响的缓和手段

然而，就在中苏政府代表团忙于就中苏同盟条约进行谈判的时候，新疆发生了一场更大的风暴。“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按预定计划，于7月下旬发动了全线进攻。到9月初，民族军在北线占领了塔城和阿山地区，在南线越过天山冰大坂，并在南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而在中线则攻陷了精河和乌苏，直达玛纳斯河西岸，距乌鲁木齐只有140多公里。面对如此局面，朱绍良、吴忠信走投无路，心急如焚，急电重庆政府说：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41]

然而，蒋介石却另有考虑。1945年8月15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42]以后，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在东北的接收问题上，认为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的首要目的是以此干扰政府接收东北，至于“助长哈匪多占地盘”，实现其“侵新之野心”，“尚在其次”。故决定对新疆问题不可以武力解决，“即使沦陷，只可暂时忍耐”，外交和宣传也作低调处理，同时积极准备在新疆进行和宗教改革。他一方面表示允许边疆民族自治，一方面派张治中赴新疆考察，提出解决问题的报告。[43]

如前所说，新疆果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苏联实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当苏联在华的根本利益已经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以后，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新疆冲突，阻止新疆独立。这对莫斯科来说可谓一举三得：一则在世界舆论面前表现出苏联的和平形象及遵守中苏条约的姿态，二则可以免除新疆独立给苏联本身带来的后顾之忧，三则通过充当调解人巩固和加强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斯大林何乐而不为？

于是，苏联政府在9月6日即向中国政府表示：只要让各民族参加新疆省政府，特务工作放宽些，新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9月14日，苏联代总领事叶谢也夫会见前来迪化的张治中时也建议，新疆冲突最好设法和平解决，并表示愿意帮助从中疏通和联系。张治中遂电告蒋介石，建议请驻苏大使傅秉常直接向苏联政府提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并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44] 9月15日，出席伦敦外长会议的王世杰与莫洛托夫谈话，请苏联调查最近的新疆事件。莫洛托夫友好地表示，此事件只是“过渡现象”，请不必放在心上。[45] 同一天，彼得洛夫即向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准备对新疆事件进行调解，并于第二天送来了正式备忘录。中国政府立即答复，希望“事变分子代表”来迪化与张治中洽商，请苏联伊犁领事代为通知。[46]

作为调解人，苏联领事馆始终掌握着整个和平谈判的进程和节奏。和谈伊始遇到的障碍即是苏联领事排除的。三区谈判代表于10月初来到迪化时，都佩带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印章，并声称他们是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谈判的，届时将出示证明文件，

中国政府代表也须交验相应证件。对此，张治中坚决反对，并拒绝与其见面。最后，经张治中亲自与叶谢也夫交涉，确定由苏联方面从中斡旋。在叶谢也夫的劝告下，伊犁代表才放弃了原先的主张，使谈判得以启动。[47]

在谈判桌外，苏联各部门也积极予以配合。1945年10月15日，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的报告说，乌斯满与伊犁起义者协同配合“从中国人手中解放了阿尔泰地区”后，无意承认“东土耳其斯坦政府”，想使阿尔泰成为独立国家，并说这是乔巴山在1944年就允诺的，他只接受乔巴山的指示。鉴于目前正在举行和平谈判，贝利亚建议，请乔巴山给乌斯满下达指示：“停止积极反对中国的武装活动，转入防御，协助伊犁起义者谈判，和平解决与中国的冲突”。[48]

和谈期间，张治中经常与苏联领事馆保持接触。凡有新的提案，首先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并请苏联领事人员从中斡旋和疏解，如此才使谈判得以进行下去。特别是当谈判陷入僵局时，苏联领馆起了重要作用。例如，三区代表第三次来到迪化后，节外生枝地提出了撤销政治警察、事变后调来的政府军队撤出新疆、新疆警察由回教徒充任等三项新要求。对此，张治中态度强硬，表示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最后还是经请苏联领事出面进行说服，三区代表才同意暂时把这些要求搁置下来。1946年1月2日，和平条款及附文（一）签字。[49]

此期，甚至斯大林本人也对新疆和平谈判起了推动作用。为了促进战后中苏关系中诸多问题的解决，蒋介石于1945年底派蒋经国访问莫斯科。正如苏联外交部事先对蒋经国来访目的估计的那样，在12月30日的谈话中，蒋经国要求斯大林对新疆谈判代表施加影响。蒋经国说，新疆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协议，但现在三区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苏联政府出面调停。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并十分有把握地说，三区方面“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50]果然，1946年4月初第二阶段谈判一开始，三区代表便轻易放弃了前次谈判搁置的三条补充要求。当谈判在新疆民族军整编后的数量和驻地问题上历时两个月而争执不下时，也是苏联新任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和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出面，多次与双方接触，居间调解。到6月6日，附文（二）终于正式签字，和平解决伊宁事变的工作全部告成。[51]

不过，莫斯科放弃对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支持，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而只是在国际格局和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调整了策略和方法。通过在幕后导演和平谈判，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

武装割据：苏联对新疆三区的全面控制

和平条款的签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1947年2月25日迪化发生了民族冲突的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在各地采取了强硬的高压政策，新疆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地武装冲突再次出现。以至张治中不得不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民族人士麦斯武德，参加联合省政府的三区代表也陆续回到伊宁。新疆形成了三区武装割据，与地方当局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已无法实现通过维持联合政府及和平局面来保证对新疆进行控制的策略，便暂时把目标转向以加强对三区的控制为主，静观全局变化。

苏联控制三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大量苏联侨民，甚至鼓励新疆少数民族加入苏联国籍。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以及全盘集体化和驱逐富农时代，有大批俄国人自中亚流入新疆。

中国当地政府向这批苏侨发放了公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作“归化族”。就在和谈开始后不久，1945年10月29日，布尔加宁等人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提交了政治局“关于接收旅居满洲的俄罗斯人为苏联公民”的决定草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帝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草案，及审查程序、申请书、居住

证样式等相应材料。1945年11月1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这项命令。几天以后，加里宁再次签署主席团命令，宣布关于满洲俄侨的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52] 1946年2月1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出布告称，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文告张贴后，前往登记者络绎不绝。不久，苏联又延长入籍登记日期，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人加入苏籍，并许诺对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并可免费看苏联电影。[53]

1946年11月，在伊犁、塔城和阿山分别成立了苏侨协会。苏联驻伊宁领事达巴申声称，苏联将通过苏侨协会向苏侨和新疆人民提供帮助。苏侨协会完全在苏联领馆的控制之下，他们经常向领事馆请示工作，并汇报情况和提供情报。苏侨协会还有自己的报纸和旗帜，在三区享有特权，被人称为“国中之国”。[54] 这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期苏侨人数迅速增长，而且新发展的侨民，大多数并非原俄罗斯人，而是新疆的少数民族。1945年11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2.5万人。[55] 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1946年发展苏侨2000人，1947年即增加了13000人，1948-1949年更猛增了40000人。[56] 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6.5万户，共20余万人。[57]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苏侨人数如此剧增，显然是因为有大量当地居民取得了苏联国籍，除非发生了一次令人瞩目的民族迁徙，但并没有这样的记载。

此外，苏联还训练了一批亲苏的华侨，并将他们送回国内。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迪化情报组报称：莫斯科、塔什干等地现有华侨1600余人请领护照回国。苏方对申请回国的华侨，有的拖延两三年不发护照，但如果华侨能接受格伯乌（KGB）训练，并充当苏联间谍，则准许其搭乘苏联飞机来新疆。[58]

如果说苏联在侨民问题上的做法是为了加强其控制新疆的社会基础，那么苏联此时更重视的则是在三区领导机构中肃清不忠实和不可靠分子，提拔和扶植亲苏人物主持政务。和平条款签订以后，苏联本来已经把苏联顾问团、军事指挥人员，以及在三区政府中任职的苏籍官员和顾问撤回国内，到1947年8月底，应三区方面的要求，苏联又重新派顾问团秘密来到伊宁，代号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二办公室”。同时还派出500多名格伯乌（KGB）秘密特工潜入伊犁，加强对三区人事和局势的控制。[59]

作为三区革命初期的头面人物，艾力汗·吐烈具有强烈的独立倾向。当初为了鼓动新疆起事，苏联利用了吐烈在民众中的宗教影响，支持他推翻新疆的汉人政府。但是吐烈在骨子里是反苏反共的，特别是苏联的策略改变以后，其反苏情绪更为严重。吐烈不满当时在伊犁政府和军队中任副职的苏联人掌握实权，抗议苏联人在边境收购被盗的新疆农牧民的牲畜，反对苏联在新疆大量发展苏侨，以及过多地干预三区政府的事务。最令苏联头痛的是，吐烈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伊宁事件。在和谈前夕，吐烈先后在塔城和承化主持召开了“临时政府”委员会流动会议，宣布塔城专区和阿山专区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和平条款即将签字时，吐烈又极力反对苏联顾问停止军事进攻的命令，力主继续进军，趁势解放全疆，甚至在伊宁召开大会，宣布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为正式政府。[60] 对于这样的人，苏联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在联合省政府正式成立前夕，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强行将艾力汗·吐烈等民族上层人物秘密押解出境，送往阿拉木图。[61]

苏联选中取代吐烈的人物是阿合买提江。据1949年8月苏联驻伊犁领事阿里斯托夫向邓力群介绍，阿合买提江是联共（布）党员，是苏联派来搞情报工作的，完全可以信任。在三区革命爆发时，阿合买提江只是一个报纸编辑，并不是当地的主要人物。后来苏联感到吐烈不可靠，才

提拔阿合买提江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办公室秘书、军事厅军事科长等职。和平谈判前夕，“临时政府”通过 103 号决议，增补阿合买提江为“临时政府”委员。在谈判期间，张治中发现，阿合买提江虽然只有 32 岁，是三区代表中最年轻的，但却是和平谈判三区方面的实际负责人。[62]此后，阿合买提江便成为三区的首要领导人。

最能说明此期苏联强化对三区控制的，是苏联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渗透到三区，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在当时三区的领导人中，与中共和汉族革命者接触的主要人物是阿巴索夫，而这位三区革命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却为此受到苏联的冷落和压制。

自从盛世才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将陈谭秋等中共干部逮捕下狱以后，中共在新疆有组织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1944 年 11 月，李泰玉、陈锡华等进步青年组织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试图与中共取得联系。1946 年和谈期间，他们借同学关系找到三区代表阿巴索夫，并通过阿巴索夫参加国民大会的机会，请他与南京的中共代表联系。12 月 5 日晚，阿巴索夫秘密前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见到董必武，详细汇报了新疆和三区的情况。当晚，董必武即将所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12 月 6 日中共中央复电，建议由阿巴索夫带中共代表及电台一道返回新疆，以便建立与延安的联系。阿巴索夫回到迪化后即召集李泰玉等人开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由于中央代表彭国安的电台功率太小，无法与延安取得联系，经过讨论，决定把阿巴索夫秘密建立的“人民革命党”与“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党，并按照中共党章的原则起草了章程。根据董必武关于在新疆的组织不要过早打出共产主义旗帜的指示，该党取名为“民主革命党”，阿巴索夫任主席，李泰玉、艾斯海提任副主席。1947 年夏天，由于迪化形势紧迫，民主革命党领导成员及中共中央代表随同阿巴索夫撤退到伊犁。[63]

当时，所有这些与中共和汉族革命者的联系，阿巴索夫都是背着苏联人做的，也不敢告诉阿合买提江。到伊犁后，民主革命党又发展了 100 多人，主要是那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但仍是秘密组织。阿巴索夫一再要求党员保密，绝对不能让苏联人知道。后来，苏联领事馆还是听到了有关民主革命党的消息。1948 年 5 月，苏联领事委托阿合买提江找阿巴索夫和赛福鼎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并勒令其停止活动，销毁一切文件。此后，阿巴索夫便被苏联人冷落了。协调三区统一行动的“新疆保证和平民主同盟”成立时，阿巴索夫作为三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连组织委员（相当于中央常委）都没有选上。另据邓力群回忆，当时苏联领事对李泰玉也极为不满。总之，苏联绝对不允许外人插手三区事务。[64]

当然，苏联并没有满足于对三区的控制，而是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随时准备恢复在整个新疆的影响。苏联驻迪化副领事乌里马索夫于 1947 年 8 月 15 日召集苏籍人士谈话时说，“勿以目前迪化市现状而灰心，不久我们苏联即可占领全新疆”。伊犁苏侨会主任吴国林（又名马力牙奴夫）也经常对苏侨讲：苏联对苏侨甚为关怀，你们前途已露曙光，一切困难即将过去。[65]

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1948 年，中国革命迅猛发展，国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改变了对华策略，开始积极参与中国事务。当时国民党政府因关内战事紧急，已无暇顾及新疆，主持西北政务的张治中则力主撤换在新疆采取强硬政策的军政首脑宋希濂和马斯武德，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苏联也希望趁此机会与新疆地方政府改善关系。1948 年 6 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表示，中苏双方应先停止有碍睦邻友好的宣传，以促进新疆和平。

10 月 10 日，阿合买提江与外交部代表刘泽荣会晤，表示三区绝无脱离之意，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并建议张治中今后谈新疆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外交关系。[66]莫斯科的意图很明确，即通过改善与地方当局的关系，走出三区，重新控制整个新疆。

议结新盟：保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

正在苏联试图与新疆地方当局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的时候，又出现了两个新情况，迫使苏联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

一个情况是，到 1949 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遂派联共（布）中央局委员米高扬专程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详细地了解了中共的政策和主张，而后决定了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毛泽东则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议新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具体事宜，并公开宣布了未来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67]

另一个情况是，美国开始插手新疆事务，试图与当地反动力量勾结，加强美国在那里的影响。1948 年 6 月，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策划组织下，成立了以乌斯满为首的反共反苏反三区“革命委员会”。[68] 1948 年 10 月间，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政府秘书长艾沙与美国驻迪化总领事包懋勋秘密商议，为了保证新疆不落入中共或三区手中，应成立“泛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求得独立。美国率先予以承认，再由美国出面游说中东各国承认，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造成既成事实。1949 年 5 月，包懋勋进一步确定了新疆独立的具体方案，同时策动坚决反共的新二师师长叶成掌握新疆军权，还积极与马步芳、尧乐博斯和乌斯满等地方反动势力联络，妄图全面控制新疆。[69]

这时的新疆，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美国企图乘虚而入，而莫斯科碍于国际舆论又不便公开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新盟友中共迅速接管新疆，显然是保证苏联利益的最佳方案。为此，莫斯科立即采取了积极措施。

当时，在毛泽东进军全国的棋盘上，新疆尚未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 年 5 月 23 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 年春季“开始经营新疆”。6 月 26 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进展顺利，可于“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7 月 20 日彭德怀报告，已消灭胡宗南 5 万余人，计划“明春夏入新疆”。[71] 然而，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放心。对美国势力渗透新疆的忧虑，使苏联不得不向中共提出及早进军新疆的迫切要求。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 6 月 27 日，即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美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马步芳的骑兵部队，并表示愿意提供 40 架歼击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72]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73] 此后，毛泽东于 7 月 23 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74]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并通告他，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75] 8 月 4 日毛泽东进一步通知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报告，“8 月底或 9 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76]

进疆的任务迅速提前，而中共对新疆的具体情况却一无所知。根据邓力群的回忆和“力群电台”发出的电报看，为了让中共力量尽早占领新疆，苏联的确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先后在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和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于 8 月 14 日秘密到达伊宁。此前，驻伊宁的苏联顾问团已全部撤回国内，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邓力群一行，并安排与三区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他们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邓完成任务。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关系”和邓“经常往来互相交换意见”。[77]

此期苏联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体现在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上。尽管早在 1949 年 4 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之时，毛泽东已经考虑“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了[78]，但中共当时既不了解三区的具体情况，与新疆当局也没有任何接触。而苏联方面在 7 月底

8月初已经通过与陶峙岳、包尔汉的接触，了解到新疆当局有举行和平起义的意愿。8月中旬苏联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即对陶峙岳等人表态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79]这无疑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产生了作用。

8月26日兰州解放，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继续西进，迫使新疆军政首脑下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经过与新疆当局的联系，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于9月2日亲往伊宁，并连续两次会见邓力群。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立即设法开始谈判。叶谢也夫还几次建议邓力群迅速到迪化，直接与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苏联方面负责从中介绍，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经与叶谢也夫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便通电宣布起义。[80]

当然，斯大林建议并帮助中共迅速占领新疆，也有为苏联利益考虑的一面。通过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斯大林已经知道未来新中国的领导人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是有考虑的。因此，莫斯科把新疆作为礼物奉献给新盟友，无非是希望毛泽东接受在外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既成事实。[81]同时，这样做的结果也使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从而巩固和加强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惟其如此，苏联才一再坚持中国应把新疆的省会确定在伊犁。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领事馆就曾向邓力群建议，新疆的省会应由迪化迁移到伊犁，其理由主要有两条：在政治上，伊犁是三区革命的策源地，民主干部大多集中在那里；在上，伊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而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尽管邓力群表示兹事体大，个人不能表示意见，苏联方面还是坚持要他转告中共中央。全国解放以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又在一次欢迎来自北京的代表团的宴会上，公开提出这一建议。[82]

新疆对于苏联的特殊意义，在中苏最高领导人关于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中也有明显体现。1949年底，毛泽东亲自前往莫斯科，经过一番艰苦的较量，终于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83]不过，引人注意的是，当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由赛福鼎、邓力群等人组成的新疆省代表团已经先期抵达苏联，陪同的还有驻伊犁领事阿里斯托夫和地质考察团团长斯图德尼科夫。中苏两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同时还单独要一个省组团参加，这只能说明苏联对新疆是有特殊要求的。果然，在中苏双方确定了同盟条约的基本原则后，斯大林在谈到贸易条约时，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我们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斯大林知道新疆代表团就在莫斯科，当然是希望与新疆单独签约。毛泽东的回答是：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但同时可以和新疆有单独的协定。[84]至于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条约和协定有什么不同的含义，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在后来关于苏新贸易和在新疆开办两个中苏合股公司的谈判中，中国方面均以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为首席代表，议定书也均由中央政府统一签署，只有文化协定是新疆代表团自己谈的。[85]

中苏谈判的结果，总的来说是苏联做出了重大让步，条约大体上是按照中方的意见签署的。[86]为了保障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殊利益，斯大林采取了最后的补救措施。在中苏谈判即将结束时，2月10日莫洛托夫送来一个《补充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公民参与经营活动。对此，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为了安抚莫斯科，周恩来甚至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87]虽然说苏联的这个要求确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但其目的无非是消除西方势力对新疆和东北的渗透，而这在当时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坏处。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除苏联以外，各国驻新疆的领事馆均已自行关闭，中国方面为此所做的只是要求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侨民限期放弃双重国籍。

[88] 不过,《补充协定》的签订也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希望在中国政权更迭以后仍然保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

纵观 1944-1950 年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趋向,时而与地方当局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支持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主张强硬,时而倾向缓和,但其目标始终是在中苏走向同盟关系的大前提下,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影响。尽管在对华政策中,新疆对于苏联的重要性排在外蒙和东北之后,但是,苏联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而这种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 10 年以后才陆续消除。

注释:

- [1] 详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 1981 年出版,第 408-409 页;艾伦·怀廷和盛世才:《新疆:是工具还是枢纽?》(*Sinkiang: Pawn or Pivot?*),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63、200-208 页。
- [2] 艾伦·怀廷和盛世才前引书,第 243-254 页;约翰·加佛:《1937-1945 年的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5-174 页;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2-497 页。
- [3]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3 册,第 64 页,台北中央日报社 1977 年中文版。转引自李嘉谷:“盛世才与新疆”,载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出版社 1997 年版。
- [4] 外蒙古当时已完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只是表面上的,其、军事和均由苏联垄断,除与个别国家有关系外,蒙古甚至基本没有外交。
- [5] 《战时外交(二)》,第 460-461 页;约翰·加佛前引书,第 199-200 页。
- [6]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4 年,第 6 卷,华盛顿特区 1969 年版,第 773、785、798、800-803 页。
- [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年编印,第 4 册,第 288-292 页。
- [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4 册,第 332-333、338-343 页。
- [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 年,第 6 卷,第 793、504-505 页。
- [10]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4 册,第 395-396 页。
- [11] 约翰·加佛前引书,第 204、207-209、197-198 页。
- [12] 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谈记录。
- [13] 朱培民:“1943 年至 1949 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 年增刊,第 87 页。
- [14] 朱培民前引文,第 88 页。
- [15]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 1970 年版,第 11 册,第 6521 页。
- [16]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8 页。
- [17]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1 册,第 6521 页。
- [18]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9、11-12、13 页;朱培民前引文,第 88-80 页;《达列力汗烈士纪念文集》,阿勒泰地区纪念三区革命烈士殉难四十周年活动筹备领导小组 1989 年编印,

第 41 页。

- [19] 笔者 1998 年 8 月 30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陈锡华是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及民主革命党创始人之一，并在邓力群到新疆后为他做俄语翻译。
- [20] 朱培民前引文，第 89 页。
- [21]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28-32 页。
- [22]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39、44、46、57 页。朱培民前引文，第 89-90 页。
- [23]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15-16、18 页。
- [24]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 9401，目录 2，案宗 105，第 240 页。
- [25] 1979 年 3 月 4 日彭国安同志谈三区革命情况。转引自朱培民前引文，第 90 页。
- [26]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34、43-44、64 页。
- [27] 朱培民前引文，第 90-91 页；《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35、52 页。
- [28] 谈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阿巴索夫曾经对陈锡华说过，他在苏联境内接受训练时，一位当地的负责人讲，苏联的少数民族希望在新疆有一个维吾尔斯坦，因为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在苏联抬头了。见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 [29] 关于笔者对战后苏联远东政策的分析详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5 年版）第二章：“这里是被冷战遗忘的角落？——分析战后朝鲜及远东局势的变化”，《斯大林、毛泽东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二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 [30]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 年，第 7 卷，第 995-997 页。
- [31] 详见拙文“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载《研究》1994 年第 5 期。
- [32]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71、73 页。
- [33] 梁敬年 享：“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 1 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6 页。
- [34] 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 1945 年苏联对新疆转变（见朱培民前引文第 91 页；薛衔天提交 1997 年 10 月“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试析战后苏联对中国新疆战略”），但都认为这种变化发生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以后，并以此作为“苏联对新疆战略和策略的转折点”或标志。而笔者的看法则相反，认为苏联出于对远东国际形势的考虑，恰恰是为了促成中苏条约的签订而改变了对新疆的策略，即策划三区革命、支持新疆独立和主张和平谈判都是莫斯科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的外交筹码。
- [35] 详见《战时外交（二）》，第 576-590 页。
- [36] 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49、77-79 页。
- [37] 详见《战时外交（二）》，第 598-604 页。
- [3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117-118 页；《战时外交（二）》，第 593-596、605 页。
- [39] 《战时外交（二）》，第 609-620 页。
- [40]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85 页。
- [41] 详见曹达诺夫·扎伊尔：《五军的革命历程》，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7-55 页；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18 页。
- [42] 由于准备条约文本拖延了时间，签字仪式是 15 日 6 时举行的。但日本接受投降的电文于凌晨 2 时已送达莫斯科，苏联为掩人耳目宣布中苏条约于 14 日签订。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151-153 页。
- [4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第 831 页。转引自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39 页；《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 98-99 页；《张治中回忆录》，第 418 页。
- [44]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103 页；《张治中回忆录》，第 419-420 页。
- [4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175 页。
- [46] 详见《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第 439-440 页；《张治中回忆录》，第 418-419 页。
- [47] 《张治中回忆录》，第 422-423 页。
- [48]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 9401，目录 2，案宗 104，第 62-63 页。
- [49] 《张治中回忆录》，第 429-441 页。
- [50]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莫洛托夫，1945 年 12 月 29 日。斯大林与蒋经国谈话记录，1945 年 12 月 30 日。转引自俄《近史》，1996 年第 4 期，第 106、118 页。
- [51] 《张治中回忆录》，第 446-453 页。
- [52]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 9401，目录 2，案宗 105，第 50-58 页、第 238 页。
- [53] 《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 年）》，第 478-480 页。
- [54]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202 页；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 [55]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 9401，目录 2，案宗 105，第 240 页。
- [56]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 年 10 月 10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14，页码 139。
- [57] 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 月 13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 [5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目录 2，卷号 35，页码 67。
- [59]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171、247 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2 册，第 7093 页。
- [60]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91、101、112、134 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1 册，第 6784-6785 页。
- [61] 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谈记录；10 月 13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 [62] 笔者 1998 年 8 月 30 日采访陈锡华的记录；10 月 13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118-119 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2 册，第 7093 页；《张治中回忆录》，第 449 页。
- [63] 李泰玉：“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而献身”，徐玉圻：“毛泽东与新疆三区革命”，载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纪念新疆三区革命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4-105 页、115-117 页；1998 年 8 月 31 日笔者采访陈锡华记录。
- [64] 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 月 13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 [6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目录 2，卷号 35，页码 37、89-90。
- [66]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272-273、282 页。
- [67] 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三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条件和目标”。
- [68]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273 页。
- [69] 魏锡熙：“我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种种活动”，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 22 辑，第 135、138-139 页。
- [70] 前面所引朱培民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苏联如何帮助加快实现新疆和平解放的，本文除补充一些新的材料外，着重要说明斯大林此举的背景和初衷。
- [71]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 卷，第 591-592 页、625、645 页。
- [72]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1949 年 6 月 27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宗 328，第 1-7 页。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的回忆，斯大林当时的说

- 法是：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徐则浩访问邓力群记录，1993年7月23日。笔者在此感谢徐则浩先生提供的经邓力群校正并签字的访问记录。
- [73]刘少奇致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8，第51-55页。
- [7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44页。
- [75]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的电报，1949年7月2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8，第134-140页。
- [76]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电，1949年8月4日。载中共新疆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 [77]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8月17日，8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4，页码100、46。
- [78]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4页。
- [79]《张治中回忆录》，第589页；《陶峙岳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转引自朱培民前引文，第95页。
- [80]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9月2日、3日；9月11日、13日、16日、19日、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4，页码91-95；54-63。另见邓力群：“新疆往事回忆”，载《新疆和平解放》，第349-350页。
- [81]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三章。
- [82]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10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3，页码6-7；笔者1998年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 [83]关于这一看法，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 [84]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29-38页。
- [85]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 [86]详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一文。
- [87]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4，第64-69页。这个材料说明以往人们认为中方坚决反对《补充协定》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 [88]笔者1998年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论 文】

“三区革命”为什么没有最终促成新疆独立？¹

薛衔天²

1944-1945 发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与发展的。当时苏联之所以全面扶持三区革命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权，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当 1945 年 9 月上旬，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国民党的乌苏、精河守军被歼，乌鲁木齐唾手可得的时候，苏联却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应国民政府所请，全力主导三区与新疆当局讲和，促成了这次震动中外的“伊宁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

苏联为什么对三区革命的态度发生 180 度的大转弯呢？一般研究者只从国际大环境着手，认为中苏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做出了从三区革命中脱手的保证³，不得不放弃推翻新疆现政权的方针，说服三区讲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却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在肯定中苏条约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着重论述影响苏联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另一决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

就意识形态而言，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联共（布）与苏共的最高职责，因为在任何角落、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都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强苏联的力量。因此，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从战略思想上讲，都没有放弃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尽管他们在推进这一战略时，所实行的策略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与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通行的国际法准则是不相容的，势必影响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进世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时苏联又将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放在第一位——执行务实政策。也就是说，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的时候，就发动或支持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苏联对三区革命的这次策略转变就是其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相平衡的产物。

在三区革命发动阶段的 1944 年初，苏联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受命发回关于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运动前景的资料。苏联驻喀什总领事报告说：“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没有穆斯林教会参加，就不可能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穆斯林教会无疑将在斗争的所有阶段起着主导作用”⁴。正是基于

¹ 来源：博讯 2009 年 2 月 27 日，<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09/02/200902271251.shtml>。本文也以“是推进新疆革命，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为题刊载于《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上卷），第 345-359 页。

² 作者生于 1940 年 2 月 6 日，1964 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96 年评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外关系史研究二室主任，兼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³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互换照会（一）称：“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1982，第 1329 页。

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中国问题咨询处全宗，目录 32-a，第 299 篋，案卷 11，第 1-18 张。

这一认识，在革命的初期，苏联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时，也放手让伊斯兰教会活动，利用它发动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这样，新疆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就乘机钻进革命的领导层。最初领导伊宁起义的“解放组织”共有 12 名领导成员，其中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大都是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¹。1944 年 11 月 12 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个伊斯兰传经师，又是一个泛突厥主义者。他是乌兹别克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从乌兹别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 1937-1942 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他抓去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整个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动和影响下，伊斯兰宗教界和封建上层很快地结合到一起，占据要津。当时参加临时政府的有三种成分：“其一是具有革命意识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主要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其二是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主要以艾尼瓦尔木沙巴耶夫和赖希木江为代表；其三是封建阶层的，主要以艾力汗吐烈、艾肯木拜克和加为代表”²。尽管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在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艾力汗吐烈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后，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只有阿巴索夫等极少数人被列入政府委员，大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³

1945 年 1 月 5 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 9 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何谓“东突厥斯坦领土”宣言没有做出解释，但所包括的地区，除指以三区为主的民族军控制区外，还包括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突厥语系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实际上指的是全新疆地区）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⁴。这是以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用民族解放之名，行分裂国家和民族之实的根本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违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最初发动革命的真正爱国、进步的革命者的初衷。苏联对此大不以为然。该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甫赛也夫就曾对新疆著名人士包尔汉暗示，他同包尔汉一样，也不赞成三区成立独立国家，从中国分裂出去⁵。

苏联为什么不愿意新疆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呢？因为这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是被十月革命以来新疆所发生的多次伊斯兰起义所证明了的。

在新疆与苏联的 3,200 多公里共同边界内，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边界 1,718 公里，与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近 1,000 公里，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 450 多公里，与俄罗斯联邦 55 公里。除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外，新疆与苏联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是近邻，而且与这些加盟共和国有十几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同一民族，这些民族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十月革命后，大批被红军击溃的白卫军和难民移居新疆。20 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又有大批富农涌来。在移居新疆的俄国大批侨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伺机挑起中亚地区的民族动乱，恢复旧制度。而新疆每一次大的民族暴动，又有大批新疆居民来到苏联的中亚，冲击那里的社会稳定。历史证明，新疆与苏联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一方的民族的动向对另一方民族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苏联最高决策者从不支持新疆的任何民族运动，这一政策就逐渐形成了苏联对新疆传统的务实政策。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苏联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在制定对新疆政策方面苏联一直存着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识形态派，主张在

¹ 赛福鼎著：《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年，第 296 页。

²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年，第 282 页。

³ 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第 70 页。

⁴ A. A. 哈吉姆巴耶夫：《1931-1949 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第 2 卷，莫斯科，1974 年，第 19 页。

⁵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 282 页。

新疆发动革命，在新疆实行苏维埃化；一种是务实派，反对在新疆举行任何民族革命运动，主张保持新疆稳定，与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前者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一部分苏联激进的地方负责人为代表，后者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工作人员为代表。

1919年红军对中亚地区的胜利进军，激发了一部分人的革命狂热。当时有许多跨中苏两国同一民族的人在俄国内战期间在红军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¹。其中，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在阿拉木图活跃着一个维吾尔族共产党员小组。在七河地区有50个各种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维吾尔族（主要是来自新疆的塔兰奇、回族、喀什人）的党员达1500人之多²。此外，还有数十名来自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苏联的高等院校学习，共产国际试图通过他们与新疆建立联系，在新疆建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革命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则帮助共产国际在居住于新疆的蒙古族中进行工作³。1923年曾准备召开“中国新疆省革命者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为此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并拨款5万卢布作为会议经费⁴。会议虽未开成，但说明旅居苏联中亚地区的新疆革命者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得到了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支持。毫无疑问，当时红军在中亚胜利进军的形势以及旅居中亚的新疆各族革命者的积极活动，激发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一些领导人在新疆发动革命的冲动。特别是1921年5-6月份红军进入新疆与流窜到这里的白卫军作战之后，红军在新疆地区的影响急剧上升，在新疆发动革命问题被一些人提上了日程。

1919年秋，俄共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向突厥斯坦派遣一个全权委员会（后来改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从1920年7月起，绝大部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对新疆关系问题都要经过该委员会（中亚局）讨论。在讨论中，该局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亚·鲁祖塔克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并将该建议提交1921年6月4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鲁祖塔克的提议被否决了⁵。

但是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人员仍然试图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且，鲁祖塔克不乏支持者。1922苏俄驻新疆商务代表卡赞斯基（旧译作喀赞斯克依）就是一个激进的“世界革命”的鼓吹者。以致契切林不断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中亚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提出切实的报告。这些在中亚和新疆的工作人员了解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在新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异想天开。被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授予全权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当时设在在喀什，负责与新疆当局进行外贸谈判）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虽然在喀什举行武装起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引发这一暴动有多么容易，将这种自发的社会力量引入相应的轨道就有多么困难。喀什的居民极其蒙昧，并仇视与‘异教徒’有关的一切事物。他们还处于宗法氏族阶段，刚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苗头。因此，对尽人皆知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勿需成为先知就可预言，泛突厥主义者的民族革命浪潮冲击的不仅是汉人，还会冲击到我们”。由此，报告得出结论说：“目前我们不应向着喀什的穆斯林群众，而应向着他们的奴役者汉人。我们应在一段时间里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发动革命的尝试，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奉公守法的”。⁶

对有人想将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想法，驻中国新疆地区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全权代表C·纳措夫予以坚决驳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破坏中国完整的运动将给协约国以口实，

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3，第53张。

²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8，第33张。

³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27，第3-4张。

⁴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56，第2张。

⁵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3，案卷174，第4张。

⁶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总卷102，案卷5，第48张。

实现其将中国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夙愿，这意味着中国彻底地被国际资本奴役”。其二，纳措夫认为，新疆超前的、无组织的武装斗争“势必我方冒提供切实的武装援助之风险，可能会有损于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外交工作：因为国际外交界无疑会利用类似的机会在中国公众中进行反苏宣传”¹。以上为数众多的报告，特别是类似于上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和纳措夫的报告对苏联最高领导人做出对新疆的决策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中国新疆当局的领导人都坚持执行对苏联的友好政策，也为苏联最高领导保持与新疆的稳定的关系创造了条件。1927年2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泽连斯基和卡拉汉（当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负责对华事务）的报告后，就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做出了“特别决定”，结束了关于是否在新疆举行革命的争论。决定说：

“1、未与联共（布）中央中亚局具体商定人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不得派出维吾尔族工作人员。2、建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采取措施取缔武器交易并防止维吾尔族武装人员穿越我国国界进入新疆。3、建议中亚局和哈萨克边区党委重新审查维吾尔族分部（由维吾尔族党员组成的俄共基层组织）的组织人员构成，不允许参与新疆维吾尔运动的人员从事这项工作。4、责成贸易人民委员部吸收中亚团体参与制定活跃和加强苏联与新疆的经济联系的措施。5、认为促使新疆或该省的一部分脱离中国的任何活动或鼓动都是极为有害的和不能容许的”²。从此，维族联共（布）党员和维族红军军人以及苏联武器弹药一律禁止进入新疆，共产国际在新疆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苏联对新疆的贸易更加顺畅的发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新疆方面的投诉，责令苏联外贸部门，改变拖拉对新疆供货，扣押新疆商人的货物等违规做法），至于关于鼓吹新疆独立等割裂新疆宣传，更受到严格禁止。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使苏联对新疆的基本政策稳定了下来。经过实践中的充实发展，这一基本政策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不搞新疆独立，维护中国领土完整；2、不管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何，都与新疆省政权打交道（“向着汉人”），不与地方民族势力打交道（“不向着穆斯林”）；3、只要新疆地方政权不反苏，执行对苏友好睦邻政策，就积极与其发展经贸关系，支持这个政权存在。由于苏联多年坚持，于是这些内容形成了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

统治新疆的中国军阀们也深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奥妙。从杨增新时代（1912-1928）起，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统治者基本上执行两大政策：对内，承认中央政府，不打独立旗号，以取得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亦即取得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合法性；同时尽量排斥中央势力进入新疆，保持新疆半独立状态，以维持其独裁统治。对外，亦即对苏联实行亲善友好的政策，以取得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维持新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这样，新疆当局与苏联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苏联为中亚地区的稳定需要新疆局势稳定，新疆当局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稳定新疆局势，而要稳定新疆局势，就必须执行对苏友好政策。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使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经受住了几次严峻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发生在20年代末中苏关系全面危机时期。1928年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他的上台，与苏联在北伐战争中对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全面支援是分不开的。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驱逐苏联顾问，断绝与苏联的一切联系。但当时的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不顾中央的命令，坚持维持对苏友好政策。苏联也没有以中国中央政府的对苏联的态度而改变其对新疆的政策，即使是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白热化阶段，苏联驻新疆的所有外事机构都收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苏联对新疆关系要“维持原状”³。苏联有关机构严格遵守命令。

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案卷48，第123-124张。

²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下册，莫斯科，1996，第619页。

³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08（卡拉汉档），目录12，总卷88，案卷254，第9张。

这样，在中国中央政府处于对苏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而在新疆一隅却维持着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这次考验说明，只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得到维护，它并不理会中国中央政府对其态度如何，照样维持与新疆的传统关系。

第二次考验，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1931年新疆发生的哈密事变¹，和由此引发的泛突厥主义的大泛滥——喀什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及全疆，起义者曾控制了新疆80%的土地。由于苏联一直宣传自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新疆起义各族与苏联中亚地区各族又大多属于同一个民族，一些起义者很自然地把乞援的目光投向了苏联，要求苏联给予实际的援助。起义领导人之一、曾留学苏联、并与共产国际有密切接触的尼扎梅金就曾向苏联驻喀什总领馆提出从苏联购买武器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²。当时，正如在2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思想激进的负责干部，特别积极地要求苏联当局站在起义者一边，就势在新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1931年9月驻塔什干共产国际代表多尔夫通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说：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认为，新疆的起义“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帮助这次运动，应在新疆开展积极的革命工作”，鲍曼还指出，“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反对帮助汉人镇压起义”³。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还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在新疆和甘肃开展革命工作，并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建立革命党⁴。

当时所有的情报都证明新疆政权已不堪一击，是支持摇摇欲坠的新疆现政权，还是支持起义者，苏联最高决策者在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要求苏联支持维吾尔等新疆起义者的请求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由新疆起义激发起来的反苏洪水也开始大肆泛滥。插进起义队伍中的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国则在喀什大肆活动。英国和日本特务在南、北疆兴风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起义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苏联工农红军情报处给政府的报告说：“起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寿终正寝和穆斯林国家建立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导致争取自治的漫长的民族斗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不排除维吾尔人内部在和田与喀什之间争取自治的斗争。类似的情况会被英国人广泛利用，以扩大其在喀什的影响，消除我们对新疆经济影响的优势地位，并对我国边境构成威胁”⁵。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最高决策者的高度警惕。

所谓对苏联边境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是指“移民”。俄国内战期间逃到新疆的白卫军和巴斯马赤分子混进了起义队伍，与新疆起义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同时与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亲友保持着秘密接触，并怂恿他们向新疆迁移。当时中亚地区的农民正饱尝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之苦，于是纷纷向新疆逃来，因为据说在新疆起义后的同胞已经掌握了大权，成了主人。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亚代表的报告，仅1933年一年，从苏联中亚移到喀什的吉尔吉斯移民（柯尔克孜人）就有60,000人。中亚一些著名的移民活动分子也混杂在移民中来到喀什。红军情报

¹ 哈密事变的直接起因是1931年新疆省政府应哈密农民的请求，对哈密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宣布结束王府统治制度，在哈密地区设立哈密、伊吾、宜禾三个县，废除徭役，由政府统一征收赋税。但在实际执行中，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引起农民的不满。王府封建主乘机加以利用，举行武装暴动。由于暴动一开始就被封建上层抓去领导权，并恢复原来的封建制度，所以这次起义历史上称为“哈密事变”。新疆其他地区的起义，大抵与哈密事变类似。帝国主义势力又乘机插手，造成了30年代新疆的民族大动乱。其性质与40年代的三区革命迥然不同。

²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3037，第60张。

³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2209，第9-10张。

⁴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57，第9张。

⁵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8/08，目录16，总卷162，案卷117，第9张。

处的报告预计：由于食品短缺，“巴斯马赤分子和民族反革命分子可能加紧活动，从喀什对我（苏联）领土进行偷袭。而移民与我境内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激化移民情绪，在巴斯马赤队伍进入我境内时为其扩充势力奠定基础”。¹

最使苏联不安的是，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庇护下的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193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吉尔吉斯人加纳伯克和乌兹别克人色提瓦尔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欲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他们与巴斯马赤分子沆瀣一气，大肆煽动苏联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实质就是为了纠合反苏人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加纳伯克一伙又成为沙比提大毛拉政权的依靠对象。很显然，任新疆局势发展下去，苏联中亚地区很快就会卷入民族大动乱的旋涡。

鉴于以上情况，苏联决策者不理睬激进派的各种反对意见，对新疆省当局逐步给予支持，以免其在起义烽火中彻底崩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8月5日决定向新疆出售两架飞机，飞机及两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很快被派往新疆²；1932年6月23日又确认总价值为200,705美元的军火交易，按规定，苏联总共向新疆供应8架飞机，还有空投炸弹、大炮、汽油等武器和战略物资³。在新疆省政权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苏联又毅然决定答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红军，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动乱。

苏联决定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上书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指出：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而我们对新疆反动军阀的武装援助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对维吾尔和其它民族的血腥镇压，不能不给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⁴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一定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取消支持盛世才的决定。这次考证明，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甚至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

苏联出武器和军队打败马仲英，将盛世才扶上了台，又说服哈密起义领导人和加尼牙孜参加盛世才政府，平息了自哈密起义以来的新疆动乱。盛世才执行亲苏亲共政策，新疆生产、建设和社会生活都取得明显进步。盛世才本人还加入了联共（布），并**两次提出新疆作为新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以至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⁵。可以说，苏联对新疆的务实政策在盛世才时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也正是在盛世才时代这一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盛世才“倒戈”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时刻。当时高加索地区有几万穆斯林与希特勒合作，甚至有许多人还加入了德国的“东征军”，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稳定。盛世才在这一关键时刻“倒戈”无异于在苏联的侧

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3037，第68张。

² А. Бармин,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p.116.

³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2，第195张。转引自Б. А. Бармин,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p.116.

⁴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57，第29---30张。

⁵ M.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Vol 1, p.237-238. 转引自：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194页。

肋上扎了一刀，造成了苏联十分被动的局面。盛世才的“叛卖”证明意识形态派那一通“阶级分析”是对的，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激进派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苏联对新疆传统政策的中止。斯大林与苏联其他决策者们从盛世才身上得出的基本教训是：“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来自穷苦的农牧民家庭，而农牧民们受着国民党和民族上层的“双重压迫，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在我们（苏联中亚）边界筑起一道长城（安全屏障）”¹。这段话是苏联驻迪化领事对一位著名的新疆进步人士透露的机密。它道出了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策略的核心——在支持革命的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事实上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苏联正是循着这条阶级路线走的，苏联支持三区革命者，发动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三区革命，对新疆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从传统的务实政策转移到意识形态派所主张的激进政策上来。但这时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这是苏联最高决策层在 1944 年 5 月初定下来的原则，新疆“解放组织”所发布的政策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苏联对新疆的战略要求需要转文论述）。

可是，随着“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30 年代哈密起义后所发生的一些险象一下子全露出了苗头。桀骜不驯的艾力汗吐烈一伙人极力将革命拉向斜路，而新疆移民像潮水般地中亚地区涌来（与 30 年代不同，不是苏联中亚移民流向新疆，而是新疆移民涌向中亚），仅此一项就给苏联中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更不用说这个新出现的“伊斯兰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不仅破坏中国领土和民族的统一，而且也对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冲击。十分清楚，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对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而作为苏联支持伊宁暴动的结果恰恰是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者掌权的“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内在相互矛盾的怪圈：苏联为打掉新疆的反苏政权而发动革命暴动，而为动员广大居民投入暴动行列就得依靠伊斯兰教会，而依靠伊斯兰教会就无法遏止泛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使新疆出现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反过来又威胁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这样一来，“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就成为苏联考虑重新回到对新疆传统政策上来的一个决定因素，正是这一决定因素促使苏联决策者走出了怪圈——主导三区革命领导人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和谈。以上情况表明，消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威胁是贯穿苏联对新疆政策始终的一条主线。这一威胁既来自包括新疆在内的苏联外部，也来自苏联的内部（中亚地区），最危险的情况是内外结合。中国新疆稳定与否，都对苏联中亚地区有直接影响。同样，中亚地区是否安全与稳定，也直接影响着新疆。实际上正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共同威胁使中苏两国有了切合点，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今天苏联已经解体，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各自成为独立国家，但作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分裂主义依然存在，依然威胁着中亚国家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今天的“东突”，就是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发展的极端——“恐怖主义”。我们重温苏联对新疆务实政策的历史，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¹ А. Бармин,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р.116.

【论 文】

抗战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扩张渗透与“三区革命”¹

王欣登²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新（疆）关系与发生在这一时期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斗争（后称“三区革命”），在新疆现代史的苏新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其评价问题，学术界有为数不少的人，对现行新疆史著及学校教材的定论持有异议，笔者亦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疆的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即“三股势力”）不断制造事端，成为危害新疆社会的最大祸端。2002年元旦，竟然有人在新疆人民大会堂当众朗诵鼓吹民族分裂的反动诗歌。有鉴于此，自治区党委决定首先在文化教育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再教育。笔者年过六旬，作为一名专职历史教师，认为有责任打破沉默，重评苏新关系和“三区革命”，还历史真面目，以利于正确认识新疆历史和对年轻一代的反分裂教育，此为本文的目的。

一、

重评苏新关系与“三区革命”，首先必须从全局来审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苏关系。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分别于1919年7月25日，1920年9月27日，1923年9月4日，三次发表对华宣言，明确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夺中国的一切领土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取消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特别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苏维埃政府明确宣布凡是沙俄“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但是，列宁逝世后，所有这些美好的宣言，都变成了一纸空文。斯大林不仅继承了老沙皇的侵略成果，而且在肢解、霸占中国领土方面，比老沙皇走得更远。

沙俄乘中国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外蒙古独立，并霸占外蒙古西北我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土地。1918年中国政府恢复了对外蒙古的主权，并声明唐努乌梁海主权属于中国。苏联继承了老沙皇政策，又一次策动了外蒙古的独立，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1931年，日本制造“9·18”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苏联却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于1933年5月，向日本建议出售中东铁路，1933年6月至1935年3月苏联与“满洲国”经过长期谈判，把沙俄侵略中国的遗产廉价（1亿4千万日元）卖给“满洲国”，取媚于日本帝国主义。当德国希特勒法西斯肆虐欧洲的时候，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却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希特勒一道瓜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小国，北攻芬兰，南占罗马尼亚大量领土。从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苏联为建立“东方战线”，把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三百到四百公里，侵占了约37万平方公里土地、两千多万人口的地区。苏联在西部横行霸道的同时，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个条约意味着苏联正式承认“满洲国”，正式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以换取日本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正式承认苏联肢解中国的合法性。苏联在策划外蒙古独立的同时，又将强占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正式并入苏

¹ 《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487(2003)01-0027-06。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article_201001204459.html

² 作者简介：王欣登（1937-），浙江浦江人，伊犁教育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联，并于 1944 年成立“图瓦共和国”。在全世界人民饱受德国法西斯灾难的时候，斯大林仍沉迷于同恶魔的“蜜月”幻想中，以致于不少国家把“希特勒即将大规模进攻苏联”的情报好意相告时，竟斥之为“挑拨”，仍不做战守应对措施。当希特勒发动疾风暴雨般的突然袭击时，无备的苏军一溃千里，损失惨重。自私而愚蠢的斯大林外交宣告破产。实际上，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北进”计划，德日东西夹击苏联的阴谋破产，苏联才能从远东抽调大量武器装备和军队，支撑西部危局。因此，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战斗，有力地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

其次，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时，为促使苏联出兵打击日本关东军，在 1945 年 2 月 11 日苏美英三巨头雅尔塔会议上，因对日本本土尚存的军事力量估计过高，美英首脑满足了斯大林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条件：“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二、由日本 1904 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的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1. 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2. 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3. 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大国之间背着中国搞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说明中国人民仍未摆脱任人宰割的地位。同年 6 月，美国将秘密协定内容转告蒋介石。6 月 30 日，宋子文等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蒋介石指示可以“允外蒙古战后独立”，但苏方必须承认“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对中共及新疆‘变乱’不再作任何支援”。斯大林表示：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无论延安、新疆均将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8 月 13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政府则表示：“关于新疆最近之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而当时苏联指挥官，正在新疆境内指挥军队把战火燃烧到整个苏新边境地区。

历史惊人地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满以为可以收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帝国主义把持的巴黎分赃会议，却听任日本侵吞。愤怒的中国人民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苏联却提出更为严重的侵略要求，苦斗了八年的中国人民还没有尝到胜利果实，领土和主权受到更严重的损害，中国人民却被蒙在鼓里。直到 1946 年 2 月 11 日，雅尔塔会议一周年，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才披露，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当时，疯狂抢掠敌伪财产的苏联军队，却仍赖在东北。

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沙俄总是乘人之危，以武力相威胁，花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侵略权益，先后割占我国东北和西北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精通沙俄侵略之道，肢解、吞并中国领土达 170 多万平方公里，比老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世界史还是中国史著作中，对苏联的侵略罪行，竟然无一字记载。中国领土的地图本似优美的海棠叶，而今成为马鞍形。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领土危害最大的是日本和俄国-苏联，经过八年抗战，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除钓鱼岛尚存争议，已经收复；而俄国-苏联割占、肢解、吞并的中国 3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则永无归期了，那是相当于中国现有国土的三分之一啊！如今，“台独”、“藏独”、“蒙独”和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都一直在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中国史学界的同仁，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利益上看待中苏关系了！

二、

苏联同新疆有两千多公里的边界线，由于历史的原因，新疆不少民族同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些民族，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有的民族跨界而居，联系密切；有的民族

本自苏联迁入，关系更非一般。二十世纪起，影响新疆政局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苏联中亚地区，也危害非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德意日法西斯登台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向内蒙、华北推进，威胁苏联远东地区安全。1933年，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下台，出现了盛世才、马仲英、张培元三方争夺新疆军政大权的激烈斗争。苏联一方面背着新疆军政当局，秘密恢复留居新疆的白俄军人、商人的国籍，从而出现了一批“苏籍侨民”；另一方面，在盛、马、张三人中物色主政新疆的合适人选。苏联认为：马仲英同日本有联系（盛世才诬称他是日本走狗），如果得势，从东北到新疆将是日本势力范围，使苏联从远东到中亚直接受到威胁；张培元为国民党看重，但无亲苏表现，不被苏联看中；盛世才一再派人去莫斯科要求苏联支持，并表示自己信仰马列主义，如能得到苏联援助，将来可在新疆实行共产主义。况且盛世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合法政府首脑，因此，苏联决定插手新疆政局，全面支持盛世才。

1933年底，当盛世才与马仲英、张培元厮杀的紧急时刻，应盛世才要求，一支苏联红军从霍尔果斯入境，换上中国军装，对外称“塔尔巴哈台军”，炸毁惠远城南北两座军火库和城门，捣毁张培元的大本营，逮捕各级官员。张培元突遭东西夹击，败走铁板沟，在狂风大雪中绝望，自杀身亡。另一支苏联红军从巴克图卡入境，到达塔城，换上中国军装，对外称“阿尔泰军”，长驱到达迪化，突然开炮轰击进攻迪化的马仲英军，马败走南疆。当时南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等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马仲英部回民，虽信仰伊斯兰教，但反对分裂祖国。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消灭了这个分裂政权，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从此仇视回族。

马仲英部继续向喀什方向撤退，盛世才军在苏联两个骑兵团协助下，打败马仲英主力，马仲英交出军权，流亡苏联，不知所终。盛世才掌握了新疆军政大权。

1937年，南疆再次发生战乱，盛世才再次向苏联求援。苏联出动以康斯坦丁诺夫为总指挥、夏克尔为团长的机械化部队一个团，在40架飞机、20辆坦克配合下，从吐鲁嘎尔特山口入境，与原驻乌恰的两个骑兵团会合，彻底消灭了作乱武装。苏军大部回国，一部分被改编，分驻疏附、和阗及中印边境之赛图拉、黑黑孜江干等地。1938年，配有飞机、坦克的机械化加强旅“红八团”入驻哈密。苏军控制了南疆东西大门。如果说，西南边境驻军是防止西方势力渗透的话，那么在哈密驻扎重兵，便是保卫盛世才的割据政权。一个国家未经邻国中央政府许可，屡次出兵到邻国境内作战，又长期驻军其地，从国际关系上审视，是严重的非法的军事入侵。

盛世才依靠苏联军事力量，削平政敌，坐稳“边防督办”宝座，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当上了“新疆王”。他打出了反帝、亲苏的旗号，实行“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苏联便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援助盛世才。派阿布列索夫为驻迪化公使衔总领事，大量的苏联专家、顾问、教官、医生和联共党员来新疆工作。苏联专家帮助盛世才整顿财政金融，发展农业、工业、畜牧业、交通运输，整编军队，建立军事学校和文化教育宣传通讯事业。例如：苏联专家帮助制订新疆第一个三年计划（1937-1939）和第二个三年计划（1939-1942）；苏联提供了发展新疆生产建设的两次借款：1935年5月，借款500万金卢布，以本省土产核价抵还；1937年1月，借款250万金卢布。由苏联专家设计总长1,859公里的迪伊、迪哈公路，1935年春动工，1937年7月1日正式完工通车，一周后抗日战争爆发，成为重要国际交通线。因盛世才支持抗日战争，亲苏联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迪化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应邀来新疆讲学、工作。据说盛世才几次向斯大林提出要加入共产党，愿意把新疆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因为他知道，没有强有力的后台，他这个“新疆王”是做不成的。斯大林很满意，也很信任他。1937-1938年，盛世才制造第一起“阴

谋暴动案”时，诬称苏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是“托洛茨基匪徒”，阿布列索夫被送回苏联，在肃反中竟被判处死刑。

到了 40 年代，国际风云骤变，希特勒德国突然袭击苏联，盛世才感到苏联不可靠，转而投靠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取得国民党信任，政治上转向反苏反共。对在新疆的中共党员由限制到软禁、逮捕，并秘密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领导人，作为晋身之阶；同时，又以向中央呈报为名，迫使苏联撤出驻扎在新疆的军队、地质考察人员，迪化及各地的专家、顾问、教官、医生也于 1943 年 5、6 月间陆续回国，各种军事装备、机器运回。迪化飞机修配厂、独山子油矿的油井、房屋、设备，苏军在哈密营房，由中国方面出资购买。苏新贸易中断，苏联第一次插手新疆政局以失败告终。

盛世才作为一个政客，其个人品格虽然一无可取，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是应该辩证地加以分析。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新疆省政府同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没有变，作为中国一个省的地位没有变；“保持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是盛世才的施政内容。他坚决打击民族分裂活动，清除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势力。他提出并实行的“六大政策”，符合新疆各族人民利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新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明显发展；他支持抗日战争，新疆各族人民为支援抗日，捐献了大量财物，购买了十架战斗机，表现了很高的爱国热情；新疆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可靠而稳定的后方，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交通线始终是畅通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工作期间，传播了革命思想，对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留下了深刻影响。其次，盛世才对新疆政局的控制是没有疑问的，否则他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阴谋暴动案”，滥杀无辜，连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也不能幸免。当盛世才终于投靠中央政府时，非法驻扎新疆的数量可观的苏联军队、专家、顾问等各类人员，全部含羞忍辱，限令回国，几乎看不到他们反抗的记载。

从 1912 年杨增新主政新疆，到金树仁、盛世才三届政府，都是经中央政府任命的合法的地方政府。这三十三年中，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没有同内地融成一体，也没有向中央领过一分钱。现在，终于经盛世才之手，把占祖国领土 1/6 的新疆，完整无损地交给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蒋介石称之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盛世才由反帝、亲苏、联共，到反苏、反共，从政治上来说是倒退，是反动；盛世才由依仗外国势力，当半割据状态的“新疆王”，到驱除外国势力，放弃地方割据，服从中央统一领导，从民族大业来看，是维护国家统一，是进步。因此，盛世才这个有很大消极面的人物，也有值得肯定的积极面。

三、

苏联军队和各类人员被迫从新疆撤离，苏联当局恼羞成怒，转而采取一系列罪恶的阴谋活动。

（一）制造分裂中国的舆论

曾任盛世才政府顾问的满素尔·肉孜耶夫（苏共党员，维吾尔族）炮制宣传品，称中国的边界是长城，新疆是清朝新夺取的疆土，鼓吹“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用维吾尔文、哈文印刷，走私入境。

（二）拉拢艾力汗·吐烈

艾力汗·吐烈，乌孜别克族，原为苏联安集延大阿訇，因鼓吹泛伊斯兰主义，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1929 年定居伊宁，1937 年被盛世才逮捕，1941 年出狱，任伊宁白都拉清真寺大阿訇。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鼓动下，他放肆地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反汉排汉，反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歪曲新疆历史，煽动分裂、独立。

（三）设立军事基地，培训骨干

在阿拉木图、安集延、塔什干等地设训练基地，对新疆在苏学习和逃苏人员，进行军事训练，

作为武装斗争的骨干。

（四）建立秘密组织，准备武装暴动

伊犁、塔城、阿山、南疆分别进行。

1944年4月，在苏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帮助下，“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主席艾力汗·吐烈，成员大多数是宗教上层人士、富商、大地主、牧主，有个别进步青年。他们把白都拉清真寺作为活动据点，在封建上层、宗教人士中进行秘密串连。

1943年12月，在外蒙古的支持下，乌斯满在布尔根河成立“阿尔泰哈族复兴委员会”，自任“帕夏”（王），提出禁止汉人居住阿山，禁止汉族军队驻扎阿山等项主张。1944年4月上旬，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潜入青河会见乌斯满，派来一批军事顾问，供应武器、弹药。

1944年5月，在苏驻塔城领事馆的帮助下，塔城成立了几个秘密组织（“战斗小组”）。6月，肉孜耶夫在苏联境内的巴克图村建立了依密勒指挥部，负责塔城一带秘密活动。在他安排下，塔城各“战斗小组”合并组成“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组织。

1944年9月，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柯尔克孜族，在苏境内筹建“蒲犁解放组织”和蒲犁游击队，命努尔阿吉等率蒲犁游击队，从苏联越境攻打蒲犁县。

在这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时，指责盛世才制造蒙中边界冲突，表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是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措施。这种指责全系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当时的新疆，由于盛世才一再制造“阴谋暴动案”，关押并杀害了许多政敌，也关押并杀害了各民族的一些上层分子、富商，因而激化了民族矛盾；为了偿还苏联贷款和满足来新苏方人员待遇，又必然加重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盛世才投靠中央政府后，为了表示他的忠诚，决定新疆捐献军马一万匹，这更激化了同伊、塔、阿三区牧民的矛盾。1944年9月，盛世才被免职，调离新疆，朱绍良、吴忠信主政新疆，出现了磨合期的“有效权力空隙”：朱、吴刚入新疆，对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复杂性估计不足而应对失当；原属盛世才控制的新疆军队，分驻各地，群龙无首，人心浮动，士气低落；刚入新疆的国民党军队，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这种状况，正好被苏联所利用。

苏联在整个苏新边境地区的活动，显然有一个高级决策机构在谋划、指挥。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首先攻打阿山地区，吸引迪化驻军主力，然后夺取伊犁。

1944年6月初，在苏联留学的哈萨克民族上层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和铁木尔汗、阿热甫拜等13名苏联顾问（“白房子顾问组”）取道外蒙古到阿山游击队营地，参加领导指挥。在这前后，布尔津、福海、哈巴河、吉木乃、和丰各县都建立了游击队，许多苏军、外蒙古军人在游击队中作战。10月，“阿山革命临时政府”在青河县布尔根河成立，乌斯满任政府首脑，达列力汗任政府副首脑兼军事总指挥，将阿山游击队整编成为九个大队，在苏联、外蒙军事顾问的帮助下，攻打承化寺（今阿勒泰市）。果然，朱绍良调集近五千名军队，配备飞机、大炮、坦克，向阿山开进，以解承化之危。

接着，制造“伊宁事变”，夺取伊宁及整个伊犁地区。为此，苏联人又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先夺取巩哈（尼勒克），吸引伊宁驻军，然后乘虚攻占伊宁。

早在1944年8月，苏联侨民帕提赫·莫斯里莫夫组织巩哈游击队，发起“巩哈暴动”。10月7日，游击队攻占巩哈县城。伊宁驻军主力1600人调往巩哈平乱。苏联侨民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在果子沟组织游击队，形成战略呼应。11月初，苏驻伊宁领事馆认为伊宁暴动条件成熟，一面派人向苏联求援，一面调巩哈游击队攻打伊宁，同时在城内发动和武装群众。11月6日苏联军官阿列克山德洛夫率一支军队从霍尔果斯潜入伊宁，同“伊宁解放组织”组成军事指挥部，阿列克山德洛夫为负责人。同日，列斯肯袭击芦草沟区派出所，占领芦草沟，切断迪伊公路。当晚巩哈游击队三个大队到达伊宁城郊待命。11月7日，伊宁暴动开始，外有巩哈游击

队进攻，内有苏军和武装人员呼应，驻军中少数民族士兵哗变。11月9日伊宁驻军负责人曹日灵，电告朱绍良内有：“名为剿匪，实为国际战争”。“市区土匪全为归化人及塔塔尔族，以其领事馆作根据地，所获武器系苏联制造”。10日，伊宁全城被攻占，守军残部及各地逃来的汉族官员、群众约8000多人，撤至城郊飞机场及艾林巴克、鬼王庙两处高地，固守待援。此为“伊宁事变”。

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在维、哈、柯俱乐部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东土国政府”），其政府成员绝大多数为宗教上层、民族上层、富商、大地主、牧主及苏籍侨民。苏联军官阿列克山德洛夫任游击队总司令，统一指挥在各地作战的所有武装力量。11月16日，穆努诺夫和苏联军官亚历山大、伊万·雅可夫列维奇·颇里诺夫率一个营骑兵，从苏联来伊宁参加围攻艾林巴克的战斗。11月下旬，以符拉基米尔·柯兹洛夫为首和以符拉基米尔·斯特潘诺维奇为首的两个苏联顾问团，对外称“一号房子”、“二号房子”，来到伊宁。同时入境的还有苏联作战、情报、通讯等技术兵种军官，分散到各部队担任要职。柯兹洛夫，格鲁吉亚人，苏军中将；斯特潘诺维奇，50多岁，贝利亚派来的代表，对外称“二号房子”，权力极大，他的决定是最后决定，必须执行。

新疆军政当局仓促制订了“五路围剿”的作战计划，在气候严寒、地广人稀的新疆，根本无法实现。其中一路沿迪伊公路西进，受阻于果子沟，面对冰雪筑成的路障，坦克、战车无法逾越，又受不断狙击，只得退兵。另一路谢义锋率一个团，从精河出发，攻占科尔古琴达坂，经过一天战斗，抵达皮青里山沟，距伊宁飞机场只有20公里，灯光都看到了。第二天早晨，正煮早饭，突遭游击队炮击，炸断郑副团长的手，运送给养的后勤人员误入游击队营地，粮食弹药全被夺走。气候严寒，雪深没膝，粮弹告罄，谢义锋权衡再三，下令撤退，一千多人返回精河。（我院退休医师曹振海先生，时任该团卫生队长，上述内容，他面告笔者。）谢义锋部作战的枪声，困守艾林巴克的孤军都听到了，曾寄予很大希望。担任总司令的阿列克山德洛夫也听到了，带着抢来的一车财物准备逃跑。为此，改由颇里诺夫任总指挥官。颇里诺夫本是白俄军官，沙俄驻伊宁马队队长，十月革命后留居伊宁。1938年被盛世才拘押，苏联引渡回国。颇里诺夫久住伊宁，熟悉地理、环境、民情，在他和苏联顾问指挥下，以训练有素的苏军为骨干，配以重迫击炮、烧夷弹的轰击，经过80多天的长期围攻，1945年2月1日，攻占艾林巴克。伊犁地区各县政府官员，没有军队保护的，闻风而逃；有军队驻扎的，均发生激烈战斗。绥定县城久攻不下，一支苏联工兵炸塌城墙，才攻占该城。

1945年6月初，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民族军总指挥部制订了北、中、南三线作战计划。颇里诺夫率军进攻塔城，7月31日占领塔城，肉孜耶夫的依密勒指挥部解散，带了一批苏联顾问到塔城做官。9月上旬，攻占阿山地区，北线战斗结束。中线军队沿伊（犁）迪（化）路东进。9月4-8日，颇里诺夫在苏军支援下，出动三架飞机，并有装甲车、炮兵配合作战，经过激战，攻占重镇乌苏。9月5-8日，穆努诺夫在苏军帮助下，攻占重镇精河，中线民族军一直推进到玛纳斯河。南线战斗在蒲犁、拜城、阿克苏、温宿等地展开。苏新边界形同虚设，苏军和各种武器装备可以任意进出，战火燃烧在整个苏新边境。由于苏联入侵造成的新疆局势极其危急！

四、

1944年11月7日，伊宁暴动开始，11月12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这两个日子耐人寻味。前者透露了“伊宁事变”同苏联的关系；后者是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日子，挑选这个日子建国，表明分裂中国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苏联为了制造这个“东土国”，到底出动了多少军队、顾问、教官、专家，恐怕已经无法说清。进入新疆作战的军队，至少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出动了飞机、装甲车、山炮、轻

重迫击炮、高射机枪等，其中一次战斗中有使用山炮、轻重迫击炮百余门的记载。发生在伊犁、塔城、阿山和南疆的任何战斗，都有苏联顾问和苏军参加。苏联一手扶植的泛伊斯兰主义分子艾力汗·吐烈，既是“东土国”政府主席，又是统揽军事指挥大权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被授予“元帅”军衔。他身边的苏联顾问莫合森，如影随形。真正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是在伊宁的“二号房子”，斯特潘诺维奇，他的上司是坐镇阿拉木图的特务头子贝利亚，然后通向苏联领导核心莫洛托夫、斯大林。艾力汗·吐烈和颇里诺夫是实施侵略的文武两个打手。

1945年1月5日，“东土国”政府公布“九项宣言”，宣称“在东土耳其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解放的共和国”。艾力汗·吐烈到处发表分裂中国的演说，把“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斥为“谬论”，宣称“东土耳其斯坦是我们的祖国”。在民族军成立大会上，他煽动分裂中国，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情绪，授予各部队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前进”口号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在军队中派驻神职人员，团设宗教副团长，连设专职阿訇，主持士兵日常宗教活动，负责以“圣战”精神鼓励士兵为真主而战，为消灭“异教徒”而战。“东土国”政府设宗教事务厅，直接领导宗教法庭，独立行使审判职能。伊宁设最高宗教法庭，每县建立宗教法庭。宗教法庭全部由“法孜”（宗教法官）组成，设有庭长、审判员、法警。宗教法庭不仅有审判权，兼有公安机关逮捕人的职能。宗教法庭实行一审判决，所判案件，当事人没有辩护权和上诉权，审判的法律依据是“沙里亚”（伊斯兰教教法）。同时，从1944年起开征“吾守尔”（什一税）、“扎卡提”（课）。1947年11月18日，阿山专区宗教人士的代表大会“决定”中，竟有“对惨无人道的罪犯，可给予枪毙、吊死、砍掉一只手和一条腿、流放等惩罚”。这些人居然提倡如此野蛮的惩罚，其落后反动，读者应十分清楚了！

早在“伊宁事变”酝酿阶段，艾力汗·吐烈一类反动分子就煽动反汉排汉。“东土国”成立后，出现了惨不忍书的民族仇杀。人人皆知、史家忌书的一个血腥口号叫“杀回灭汉”。东北籍汉人（盛世才是东北人）几乎杀光。许多善良的维吾尔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汉人藏在自己家里。张治中先生1946年8月28日至9月4日亲临伊宁，他记述道：“三区汉人被杀的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了老弱妇孺数十人，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青壮年都被杀光了”。必须指出，进行民族仇杀的不仅仅是个别极端分子行为，同“东土国”政府的反动政策有关。1945年5月，“东土国”政府命令各县汉族群众到各县公安局集中，然后将东五县（昭苏、特克斯、巩留、新源、巩哈）的千余名汉族群众集中到宁西县，将西四县（伊宁、绥定、霍尔果斯、宁西）的两千多名汉族群众集中到惠远。8月6日“东土国”政府财政厅、土地水利厅联合决定，由土地水利厅负责监督收割伊犁各县汉族群众地里的庄稼。各县可将原汉族群众土地中的菜地和果园作价出售，其余土地可承包给私人。这种政策，令人想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

汉人过着鱼游釜底的日子，其他各族劳动人民同样被套上了枷锁：当时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总人口才70多万人，基本上经济落后的农牧区。持续的战争，大批的苏联军政人员，庞大的军队，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艾力汗·吐烈的第一项“外事活动”，是写信给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要求解决武器弹药，将用人民捐献的财物或牲畜交换。艾力汗·吐烈的第一次“外事交涉”，是写信给苏联驻伊宁领事：求苏联政府严肃处理苏联边卡上擅自收购特克斯、昭苏等县农牧民被盗牲畜的人员，制止此类事情的继续发生。因为战争需要，规定年满18岁-45岁的男性公民都要服兵役，原则上一户留一个劳动力；征用私人汽车、油料、工具、材料，以保证军事物资供应，企图藏匿者按军法制裁；规定各级政府按原来管理范围征收赋税。新增的税目除“吾守尔”、“扎卡提”等宗教税外，还有按牲畜总数的3%-5%征收“青草税”（1945年4月10日命令），印花税（7月26日决定）。1946年1月12日“东土国”政府通过决议，征收的税种为营业税、工业税、贩运税、活畜税、牧业税、屠宰税、木材税、粮食税、土地税、包裹税、

邮税、运输税、煤炭开采税、影剧院营业税、执照税、海关税、盐税、烟酒税共 18 种。加上前面已述税种，达 20 多种。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逼债之凶暴严酷。1945 年 3 月 18 日，“东土国”政府决议：在 4 月 16 日以前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者（按：原中国政府贷款），银行除扣除利息外，还要按利息的 16% -75% 罚款；至 4 月 20 日不能还清贷款的，银行除扣除利息外，还要按利息的 100% 罚款。自 4 月 21 日起，仍不能还清贷款的，除扣除利息罚款外，还要给予行政处罚。同年 4 月 2 日又决定，由财政厅负责清查原中国政府统治时期人们所欠银行的帐目，限欠款人在 28 日内还清，过期不还，按日罚款，有钱交钱，无钱交物。1946 年 3 月 3 日，“东土国”政府通过决议：决定要认真回收 1944 年中国统治时期的“采买粮”（预购粮）和征收 1944 年、1945 年公粮。一次逼缴这么多欠粮，农民还怎能活命？

“东土国”政府把县、区、乡、村的官员恢复清代总管、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的名称（总管后改县长）。1945 年 4 月 1 日，阿山专署决定：对各民族中原有的王公、贝子、台吉、乌库尔台、扎楞、藏根等部落首领的封建封号和地位应予以保持，并在哈萨克、蒙古、俄罗斯族的头目中重新封了一批封建爵号。部落首领可以跨地区征收“血亲税”（骨头税），管理各自的部落民众。

在整个“伊宁事变”和“东土国”政府文件之中，没有一条反映农牧民利益的口号、政策、法令，没有减轻农民地租负担、改善农牧民地位的举措。相反，“东土国”政府 1945 年 9 月 15 日决定：“乌苏、精河二县可将公有和无主土地在愿向政府交 2/3 收成的前提下，鼓励私人来耕种”。这个决定表明，交纳收成的 2/3 是一种优惠，则当时的农民赋税负担当在 2/3 以上。可见“东土国”政府的横征暴敛之酷，连秦始皇的“泰半之赋”，也远远不如了！

无休止的征兵、征物、征税、征粮、逼债，沉重的宗教压迫、封建压迫、民族压迫，对各族劳动人民来说，不是什么自由、平等、解放，而是陷入苦难的深渊！即令这样敲骨吸髓地搜括，仍无法满足浩大的军政开支，剩下的只有滥发纸币，不断地发行公债，当然那无异于饮鸩止渴！

“东土国”对那些反动的宗教上层、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来说，的确是天堂。他们依仗苏联势力，加官进爵，授勋晋升。1946 年 6 月 1 日，“东土国”政府通过决议，授予艾尼·帕提赫·莫斯里莫夫二人“人民英雄”称号。这两人都是巩哈暴动的首难者，攻打巩哈、伊宁的功臣。但这两人的人品，却是乏善可陈。据陶天白先生（时任张治中将军私人秘书）介绍说：艾尼是个大力士，能隔墙掷牛。他是个盗贼，曾被盛世才捕押，越狱后，参加巩哈游击队，后因功被授予中将军衔。艾尼又是个淫棍，家中妻妾达 30 多人，原宁西县警察局长颜秉河之妻，即其中之一；社会上还有姘妇 40 多人。解放后因调戏宾馆女服务员，曾被王震司令员训斥。1951 年 6 月 22 日《新疆日报》刊有群众控诉他的文章。帕提赫（法提合），苏籍侨民，“伊宁事变”后任巩哈县长，利用职权，聚敛财富。他的财产超过原有的数千倍。1951 年 7 月 12 日《新疆日报》《法提合在新疆的罪行》。这两位“人民英雄”，实乃人渣，无法在新疆立足，不得不迁居苏联。

十分明显，苏联当局勾结新疆反动势力，用枪炮制造出来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是分裂中国的、政教合一的充满着严重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封建反动政权，其本质同沙比提大毛拉的政权一样，只是后台不同，前者是英国人，后者是苏联人。但危害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则大大超过前者。以至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苏联的军事入侵，说成“援助”，一些文献仍把苏联策动“伊宁事变”，说成“人民起义”，把“东土国”说成“革命政权”。绝不容许用“主流”、“支流”，“既有”、“也有”，“主观”、“客观”进行辩解。每位中华儿女必须明白，无论何人，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无论出于何因，一旦背叛了祖国，那就一笔勾销了自己。难道有不要祖国，背叛祖国，仇视祖国的“革命”吗？对分裂祖国的行为，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是不允许保留任何空间的。维护国家统一是最高民族利益。“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从纲领到行动，从内容到形式，从动机到效果，都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物。对这样罪恶昭彰的历史罪行不揭露、不谴责、不否定，岂不是放弃历史学鉴戒后人的功能吗？岂不是对现实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纵容吗？

五、

二十世纪前半期，世界各国的进步青年，朝圣般地去苏联学习。他们把苏联神圣化，把斯大林神圣化。苏联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当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时，一些中国留学生竟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荒唐口号。在苏联制造“伊宁事变”过程中，也有一部分新疆热血青年参与其中。

阿巴索夫参加了“伊宁解放组织”，接来了阿列克山德洛夫带领的苏军，担任了“东土国”政府委员兼内务厅厅长。但他反对分裂祖国和仇杀汉族群众，下令内务厅工作人员制止此类事情发生。他和夫人吕素新亲自把一些汉族群众接到自己家里加以保护，为此，“一度受压抑”（邓力群语）。23岁的阿巴索夫孤掌难鸣，无法抗衡苏联的力量。

阿合买提江1942年6月从苏联留学回来，1943年12月被盛世才逮捕入狱，1944年10月由吴忠信释放。包尔汉先生说：“在伊宁起义的日子里，可以看到他穿一件破旧的大衣，腰系线绳，到处忙碌，一会在厨房，一会儿又出现在医院和战场。其时，他的身份是提水烧饭的伙夫”。“在和平谈判之前，新疆乃至伊宁市人民，对他的名字还是陌生的”。

尽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签订，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苏联在新疆的军事行动却不断升级。美国提出了苏联在新疆的军事存在。苏联当局权衡利弊，决定改变对新疆的侵略方针。这样，便出现了张治中先生与三区和平代表的谈判。

阿合买提江等三位和谈代表，身穿草绿军装，配月星肩章和月星勋章，佩带“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证章，并要求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代表的身份与中国政府谈判。张治中断然表示：我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接见事变分子的代表，不能接见所谓东土耳其斯坦的代表。经苏驻迪化领事疏解，改用“人民代表”身份同张治中谈判。

阿合买提江的政治才能是在谈判过程中显现的，他的政治主张也是在谈判中逐渐鲜明起来的。他强烈反对民族仇杀，但对分裂行为的严重性是逐渐认识的。张治中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立场、平等友好的态度与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对他也是有感悟和启示的。事实上他起着“首席代表”的作用，依靠智慧和坚定的原则性，排除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民族分裂分子的严重干扰，表达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真正心声，在伊宁和迪化之间奔波六次，时间长达八个月。1946年6月6日，和平谈判结束，《和平条款》正式签字。阿合买提江成为新疆政坛一颗耀眼的新星，伊宁各界公认的领袖性人物。

1946年6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政令，宣布改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任副主席。6月中旬，苏联撤回了艾力汗·吐烈、阿合买提阿吉·热依木江、玉山卡里等为首的一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以及代号为“一号房子”、“二号房子”的苏联顾问团，伊宁政府各厅局的苏联顾问，民族军总指挥颇里诺夫，塔城副专员肉孜耶夫。在这以前的1945年12月，因国民政府要求，国际代表团来新疆考察“阿山事件”真相，苏联匆忙撤出了阿山总顾问铁木尔汗、副总顾问艾力汗，阿山副专员阿热甫拜，在阿山各处局任职的苏联顾问和阿山骑兵三团的苏联军事人员，真是做贼心虚！6月27日，成立近20个月，连苏联自己也不敢承认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解散，改组成“伊犁专区参议会”，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任民族军总指挥。伊犁、塔城、阿山三地区及民族军指挥权，才回到中国人手中。

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迪化召开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和平大会，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伊宁方面八人发表《告全疆各族人民书》：“今年6月28日，我们宣布在伊、塔、阿专区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3个专区分别直接归属于省联合政府，按照所签订的《和平条款》，全省人民得到了我省前所未有的最大权利”。7月16日，阿合买提江在维吾尔族群众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的运动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反对一个民族统治一个民族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求得其他民族一律共同生存、共同

发展的权利。所以我们今日的革命，就是民族解放革命”。8月22日，阿合买提江在省联合政府委员座谈会上提出：“东土耳其斯坦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不能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如果有人拿来作政治活动的理论，就是省政府的敌人，也就是全省人民的敌人”。他动情地说：“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区是新疆的组成部分。伊犁是我呱呱坠地的地方，是埋葬我们祖先的地方，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所要求的是解放、自由和平等”。同时，他开始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从而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反动思潮划清了界线。

但是，长期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宣传和苏联反动宣传，已造成严重影响。“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虽已解散，阴魂仍然不散。“东土国”机关报《东土耳其斯坦报》改为伊犁专署机关报，维文版改名为《革命的东土耳其斯坦报》。1946年11月，阿合买提江等新疆代表33人，到南京出席国民大会，阿合买提江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期间，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7名代表，向大会提交了《请在中华民国内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给予高度自治》的提案。国民政府派邵力子等人和阿合买提江等人就此事长谈多次，蒋介石多次召见，就新疆有关问题及其前途进行了专门谈话。在南京方面的疏解劝导下，阿合买提江等自动撤回了提案。

阿巴索夫是林基路的学生，思想进步。1946年5月5日在伊犁成立秘密革命组织人民革命党，阿巴索夫被选为主席。当年6月下旬，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11月7日在迪化秘密成立的进步组织）李泰玉、陈锡华与阿巴索夫取得联系。这是迪化和伊宁革命者之间的首次联系。1946年12月5日晚，在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的阿巴索夫，到梅园中共办事处谒见董必武，表达了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疆人民对毛泽东、朱德的敬意，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信件，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一些具体要求。董必武当夜电告党中央。第二天收到了党中央由周恩来草拟、刘少奇签发的复电。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次谒见董必武，董必武传达了中央批示精神，决定派彭长贵带一部电台随阿巴索夫进疆。1947年1月14日，阿巴索夫与彭长贵携带中共“七大”文件、毛泽东、刘少奇著作及一部电台随国大代表回到迪化（因电台功率不足，未能建立联系）。2月3日，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人民革命党根据中共建议合并组成社会革命党，主席阿巴索夫、副主席李泰玉、艾斯海儿·伊斯哈科夫，中央委员有赛福鼎·艾则孜、罗志等人。《民主革命党章程》中党的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自己”。“为了避免使群众特别是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成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大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而向他们进行教育，用党的理论武装他们”。阿巴索夫是伊宁方面领导人中第一个主动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人。

直至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三区代表撤回伊宁，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才有时间和精力整顿和巩固内部。从政治理论、方针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阐发和总结。伊宁曾是艾力汗·吐烈之流长期进行泛伊斯兰讲义、泛突厥主义反动思想宣传的老窝，苏联策划分裂中国的中心，现在发生了根本变化，变成了同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斗争坚强阵地，反对分裂中国的战斗堡垒。1948年8月1日，集合了新疆一切进步力量的政治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在伊宁成立，阿合买提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新盟”使用新疆这一传统的合法的地名，是对新疆内部分裂势力的明确否定，是对苏联长期进行的反动宣传的明确否定，是三区斗争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里程碑。

正是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优秀领导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驱散了伊宁上空的乌云，重申了斗争的目标是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争取政治民主、民族平等和社会进步。远处西陲的伊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三区领导人却采用多种形式介绍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译载毛泽东、刘少奇著作，在民族军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手册》，千方百计地把三区的斗争融入全国人民革命的大潮之中。1949年5月11日，阿巴索夫在第一次新

盟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说：“事实证明，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不仅在其特点、方向及其任务方面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一致，而且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或中国民族问题得到彻底和正确解决的角度上来看，也是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唯有在中国人民解放运动获得最后胜利时，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够得到彻底和正确的解决，新疆人民的前途，才是光明的”。5月25日，阿合买提江在新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汉文）上撰文说：“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有过把所有汉族都当作敌人的看法。其结果，我们没有分清朋友和敌人，而把全体汉族人一样对待，其中把朋友也打了，却保护了那些比反动的国民党官吏更凶恶的民族败类。结果，把我们民族解放运动的同盟者汉族人民推到敌人那边去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政策”。“目前的任务是急速纠正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第一阶段中所产生的错误，建立不分民族的、在没有国民党、没有帝国主义势力影响的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的新民主的新省份”。尽管伊宁仍有代号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二办公室”的苏联顾问团（1947年8月底-1949年8月初），但其性质和作用同“二号房子”有根本区别。

在没有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又受苏联严重影响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反动思想包围的条件下，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领导人，以他们的远见卓识，无畏胆略和求实精神，扭转了三区的斗争方向，并使他们的斗争成为新疆政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毛泽东给予重要评价：“你们多年的奋斗，是我们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当然，三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仍然是两个天地，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46年6月底，“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解散，三区的斗争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个转折经历了艰难而深刻的过程。1948年8月1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的成立，标志着这个转折的完成。从这时候起，把三区的斗争称为“三区革命”，才是名副其实的。

参加这一历史事件的人，相当大的一部分追随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走上革命道路，有的经过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疆历史上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但有的坚持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反动立场，只得悄然移居国外；也有的野心膨胀，成为历史罪人，自取灭亡。大浪淘沙，渣滓随浊流而去，令人感慨但无须惋惜，精华则闪耀于史册，永为后人怀念。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2]王斯德主编,世界现代史参考资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 [3]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4]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M].北京:文献资料出版社,1985.
- [5]包尔汉,新疆五十年[M].北京:文献资料出版社,1984.
- [6]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 [7]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 [8]马品彦,正确阐述新疆伊斯兰教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 [9]陶天白,沙原寸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 [10]陶天白,天山鳞迹[M].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01.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